

Research on the Policy Adjustment of Merchants in the Soviet Area in 1931

Xiuli Li

Department of History,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land revolu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k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so been carried out, and the economic problem, especially the business policy problem, had become a major problem that plagued the Soviet Area at this time. It mainly showed that the business, the market, the economic stagnation, and the businessmen were stopping or escaping from the Soviet Area around 1930. The emergence of this problem, in addition to the adverse objective conditions of the Kuomintang economic blockade, was more important to the policy of the businessmen in the Soviet area. In view of the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oviet Area and the shortage of living materials before the 1931,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gan to reflect on the policy of the merchants in this period and made adjustments, and changed the trade activities of the businessmen to support the merchants in the previous period. We can say that the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Soviet area are actually a question of the businessmen and the policy issues from different business policies.

Keywords

Chinese Soviet area; merchant policy; adjustment

1931 年苏区商人政策调整研究

李秀丽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中国·广东广州 510632

摘要

土地革命开始后, 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工作建设也随之展开, 而经济问题尤其是商人政策问题却在这一时期成为困扰苏区的重大问题, 主要表现在 1930 年前后苏区各地商业、市场冷落, 经济枯滞, 商人纷纷停业或逃出苏区。而这一问题的出现, 除了受到中国国民党经济封锁的不利客观条件影响外, 更重要的是与当时苏区执行的商人政策有关。针对 1931 年以前苏区经济发展困难、生活物资紧张等经济问题, 中共开始反思这一时期的商人政策并做出调整, 改变了之前对商人的严厉打击政策, 转而支持商人的贸易活动。从不同的商人政策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情况这一点, 我们可以说苏区的经济问题其实是一个对商人的认识及其政策问题。

关键字

苏区; 商人政策; 调整

1 引言

苏维埃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全面的经济建设时期, 在这一时期制定的商人政策在以后的革命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受到“左”倾思想和盲动主义的影响, 苏区对商人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从盲目打击到支持保护商人, 这不仅仅是商人政策的调整, 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与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国情的重要体现。对苏区商人政策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了

解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制定出了正确的商人政策,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了革命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 这一过程交织着错误与挫折, 我们要学会从中吸取经验、总结教训。

2 苏区的经济环境与市场情况

2.1 苏区的日常生活对市场依赖程度高

1927 年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等大城市起义失败后逐渐摸索出了一条更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即我们所熟知的——“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因此随后开辟的各苏维埃区域所在地基本都为农业社会。中国传统的农村经济存在

【作者简介】李秀丽(1996-), 女, 中国四川内江人, 硕士, 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着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自给自足，但是自明清以来，苏区的商业经济就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苏区所处地区多为丘陵地带。而丘陵山区地区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有一定困难，但是煤、铁等矿物资源与松树、麻、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却很普遍^[1]。随着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苏区各地的木料、纸、茶、麻、竹、烟、粮等农林产品多输外地，运销各省，而主要工业品和日用必需品如钢铁、布匹、棉纱、染料、煤油、火柴、食盐、糖等等，则纯粹是从外面输入的^[2]，有的地方如闽西永定，粮食都不能自给自足，需要外省的供给。再加上各苏区所处的地方所生产的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等大多类似，比如各地都主要种植油、豆、谷物等，这样的产品结构也使得苏区内部无法自己消化和交换，而大多生活必需的工业品则必须和白区（国民党控制区域）进行交换。概括说起来就是苏区所在地虽为农业社会，但是为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对市场的依赖程度高。

2.2 苏区面临严重的经济封锁

此时因为苏区内部产品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可以说其经济形势已是非常严峻，更雪上加霜的是这时国民党不仅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还实行经济封锁的政策，破坏各苏区的商业和对外贸易。战争本身就会严重影响商业贸易的正常交换，国民党的严密经济封锁更是切断了各苏区与外界的联系，扰乱了商品交换的正常秩序，使得食盐、布、药材和火油等日用品严重短缺，苏区物资供应不足的问题日渐显现，尤其是食盐和药材的短缺对军民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在此情况下苏区内就出现了工业品匮乏、价格上涨和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反常现象。而且封锁使得苏区商业萧条，商店大量倒闭，商人因为无法进货而无生意可做，因而停业关门。这两种情况的出现无疑使本来就极其依赖市场的苏区山区经济受到更为严厉的打击。

从上我们可以看到苏区各地在1930年前后的经济情形是市场冷落、商业冷落、经济枯滞。其冷落的突出表现就是各大小市镇许多商店或停业或倒闭，许多商人或破产或潜逃，圩场不兴，市面萧条，外来物品尤其是盐、煤油、布匹、药等日用必需品奇缺。而有的地方在革命后甚至出现了经济恐慌的严重危机，严重到乡村经济一片荒芜，全部破产，甚至

到了崩溃的边缘。

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困难，这时中共采取何种商业政策就成了能否发展苏区商业的关键之一。应该说党的商人及商业政策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几经波折，大体以1931为界，从1927年到1930年，各地严厉打击商人小贩的政策与做法普遍存在。这一时期主要是把商人当作斗争对象，对其采取敌视破坏的措施。而到1931年春夏，保护商人和执行贸易自由政策，基本成为各苏区的基本政策和行动。1931年12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从法律上正式宣布和执行正确的商人政策。

3 1931年前苏区的商人政策及其影响

3.1 错误的商人政策

在1931年以前，中共中央对商人的认识和政策长期受到“左”倾思想和盲动主义的严重影响。早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与地主豪绅的旧式剥削制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他们必是反土地革命的”，并且认为中小商贩不应该划入革命同盟者的阵营，虽然还不能说是革命的对象，但他们的存在一定不利于革命发展^[3]。这种错误的认知使得各地在执行具体的商人政策时对商人进行盲目地打击，抢夺商品、没收店铺的事件层出不穷。中国遂川县苏维埃政府甚至在布告中公开表示人民生活艰难就是由商人阶级造成的，所以禁止了商业买卖^[4]。1928年6月发生在闽西永定县溪南里的暴动中，不仅没收了丰稔市的商店、烧毁了商人的房屋及账簿甚至杀了一些无辜的商人。这种盲动的大烧杀不仅农民参与其中，对商人进行缺乏理性的“报复”，连一些不守纪律的红军赤卫队也加入进去。而在赣西南情况还要严重一些，革命刚开始时，赣西南的城镇商人就受到盲动主义的严重打击，城市商铺一律被烧毁，商人直接被当做土豪打，造成该区域商人大量潜逃。

3.2 实施的后果

虽然与此同时有些苏区能够比较清醒地看到商人在交换物资与维持苏区正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商人以及私营商业采取温和并且较为正确的措施，但是这些地方在当时整个苏维埃区域来说只占极少数，而且很多地方

的商人政策执行不力,不仅毁坏商人店铺,有的甚至将商人当土豪打。历史上,商人被看作是社会最底层的成员,位于农工之下,这是因为以儒学为价值标准的社会观念鄙视商人的“市利”和“忘义”,所以人皆以商人为贼,当这种传统观念与苏区消灭剥削的社会目标相合时,人们就很容易对商人的投机、居奇、牟利的行为深恶痛绝,以至于将他们与地主土豪视为一类人物,而对其流通物资、平衡盈缺、活跃经济的作用缺乏认识,因此往往置保护商人与商业的政策于不顾,屡生过火的抑商活动。比如说鄂豫边区曾有打击商人使其完全破产,以及阻断苏区与非苏区交界地方两边人民“夜中而市”的私相交易,使其“不敢往来”的过火行动^[5]。这些行为阻断的不仅是苏区与非苏区贸易通道,也让苏区内的商人人人自危,不敢营业贸易,情况严重的地区甚至造成了苏区中百分之七十的商人走向了反动。而这些行为最终都加重了苏区商业经济的枯滞状态。

苏区经济本生就已经脆弱不堪,而当时中共中央因为受“左”倾思想和“盲动主义”的影响,对作为商业活动主体的商人缺乏一个正确的认知,并且对其采取一些相当激进甚至错误的政策。战争年代的硝烟本来就会使得商业受到不小的打击,商人在动乱中最重要的是想方设法安身立命,然后才是谋生问题。经济封锁已经使得苏区经济寸步难行,也使得苏区内的商人因缺乏货物而停业关门。再加上此时商人在苏区内被当作是豪强地主一类的斗争对象,店铺被毁坏、商品被抢走,错误的商人政策使得1931年以前苏区各地商人面临着随时被打倒的危险,连带着依靠商人带动的私营商业也受到了严重打击。而这一切犹如恶性循环,又会加剧苏区的经济困难。

错误的商人政策加剧了社会的震荡,也使得红色政权在国民党军事和经济封锁的双重不利条件下岌岌可危,这使得当时党的一些领导人和政府机关不得不思考商人在苏区经济中的作用,反思这一时期所实行的商人政策。

4 1931年苏区商人政策的调整

4.1 个别苏区做出的调整

前文已有提及,虽然在苏区普遍将商人当作斗争对象进行打击,但还是有个别苏维埃政府能够采取正确的态度与措施,使得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从1927年秋冬开始,已经有些

地区主要从商人与市场的利害关系方面加大宣传力度,推进自由贸易和保护商人政策。例如,湘鄂西苏区对盲动主义的认识和反省较为深刻。周逸群在《关于鄂西农村工作报告》中指出,细思苏区遭受经济封锁的原因,主要危害还不在于敌人封锁,而是苏区内“受农民意识的反映,过分地摧残由城市来的小商人”,而“使商人裹足不前,农村经济不能活动”,这正是“作茧自缚”。因此,他们从1929年便下狠下决心纠正错误。

最早进行纠正的是毛泽东。他在率领红四军向闽西、赣南进发的过程中,颁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这个文告不仅取消了苛捐杂税,同时规定军需物资等要根据商人的具体财产情况进行征收,甚至宣布不再没收商人财产、保护商业贸易^[6]。这个文告纠正了之前没收商人财产的错误行为,受到商人的极大拥护。在1929年7月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不能焚毁、没收商人账簿财产进行了重申和强调^[7]。

闽西苏区的调整同样取得了很大进步。1929年秋冬到1931年春夏,闽西相继有“切实保护小商人”“避免与商人冲突导致市场破坏而受经济封锁”“贸易自由,保护遵守苏区法令的商人而不仅仅是小商人”“贸易完全自由政府不加妨害”等一部比一部完善的政策规定。1930年召开了闽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正式通过了《商人条例》,在宣布保护、支持商人贸易的同时也规定不能干涉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比如不能对商品价格进行限制等,并且在筹款问题上一定要从商人的实际财产收入出发不能侵犯其利益^[8]。这些政策扭转了一些“左”倾行为造成的不良局面,对活跃苏区贸易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1931年8月又发生了杭武县第六区拘商抄货事件,闽西政府对该事件的处理十分迅速,这样做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该区随意拘捕4名商人、没收7船货物的“严重错误”的纠正(释放商人,完全返还货物),尤其在于,它从区分封建剥削与非封建剥削的角度认识商人,从社会政策上论证自由贸易之必要的两个方面,明白深入地阐释了道理和政策,明确责令各级政府绝对不要向对待豪绅地主一样打击苏区内外商人,走向自己封锁自己的“自杀政策”,再次重申必须坚持贸易自由,使商人敢到苏区营业^[9]。这表明,苏区对商人及商业政策有一个清醒自觉的认识。

4.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统一商人政策的出台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颁布了“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并且允许私人资本在苏区“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等一系列统一政策,从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现实生产关系的角度,用国家法律规范的形式做了进一步明确的规定。

之后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以此作为苏维埃经济政策的依据:

“(一)苏维埃应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但苏维埃必须严禁商人的投机以抬高价格。应解散商会,禁止大小商人以商会名义垄断价格。如遇商人怠工,或经济封锁,危及基本群众主要生活商品的供给,或因红军需要,苏维埃应规定必须物品之最高限度之价格,但这种办法,须在必要时施行,有可能即须恢复商业自由。”

“(二)与非苏维埃区域的贸易,还绝不能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同时苏维埃政府,应实行监督这些贸易,以保障苏维埃区域必须商品的供给。银币输出必须得该地苏维埃的允许^[10]。”

1932年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陆续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的决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的决议》等法律法规。以前税则未定时,对于商业税的征收因为商业破坏无税可收,同时各级苏维埃政府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而有的就是乱收小贩商人或挑担的税,“实等于收苛捐杂税”^[11]。现在税收条例的颁布不仅使商业活动有了统一的收税标准,而且从税则的具体内容来看,对当时的小商小贩收税相当宽容,甚至予以某种程度上的保护,比如为发展当时的苏维埃经济,“对于商业出入口税和工业的出厂税暂行免税”“商业资本两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税”“商人遇险或遭意外损害,报告政府经查验证实者得许免税”^[12]。而工商业投资条例的颁布,对于鼓励私人资本投资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 商人政策调整后的作用

应该可以说土地革命伊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不善

于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对待商人问题上受到了“左”倾错误思想和盲动主义的严重影响,而将商人归入到阶级敌人一列,发生了许多随便没收商店铺子、焚毁账簿甚至是殴打商人的严重事件,造成了商人逃走、商业不兴、经济困难的悲惨局面。而随着各苏区对这种盲目打击商人政策的反省以及后来陆续出台的各种正确的从政治立场和经济立场区别对待商人并且保护鼓励商人从商的条例规则,使得商人从被打倒的对象变成了苏维埃政府的同盟者和保护对象,这一身份的改变对苏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这些政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时前往中央苏区视察工作的欧阳钦就对当地经济发展情况评论说,该区“因为策略的改变,允许自由贸易,所以商业又渐渐的恢复起来,市场的东西也慢慢多了”^[13]。与中央苏区一样,鄂豫皖苏区的成效也很明显,原先遭到严重破坏的皖西经济中心麻埠又出现了小商甚发达的景象,尤其是茶叶上市时,生意热闹极了,金家寨、徐集、丁集等市镇均渐渐由萧条冷落而繁盛起来了。此后,即使是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保护商人、市场、贸易自由一直是执行得比较好的社会经济政策之一,并成为“安定和发展社会经济,开辟财政来源的关键”^[14]。

1931年以来对商人政策调整对苏区有着极大的影响。首先主要表现在扭转苏区日益衰败的商业经济上,比如沟通各苏区之间的、苏区与非苏区的经济交易,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之前在国民党经济封锁的不利外部条件下,苏区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剪刀差问题,即农产品价格飞快地降低而日用工业品价格猛涨,苏区严重缺乏盐、药品等物资,而要获取这些物资主要依靠的是小商人在苏区与白区之间的交流贸易,但这时我们党由于没能制定执行正确的商人政策而使本已岌岌可危的苏区经济再次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当时不仅苏区内的商人闭门不兴,不敢开门做生意,连白区的商人对其遭遇也深表同情,更别提进入苏区冒着生命危险来做生意了。对商人的苛捐杂税也很普遍,新的商税法颁布后这种情况也有了好转。当时汪家桥的商人见红军既不筹饷也不没收他们的商铺钱财,反而不安的选出代表与红军交谈,表示愿意交无五百元作军饷,并且说了很多为难的话,怕红军以为他们捐少了。而在这时苏区各地基本已经实行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

因此并未收他们的筹饷,并且向他们解释说明了现在新的商人政策。这一做法的效果使商人经过这次谈话对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有了不同的认识,并且向各处宣传。要知道商人们的宣传比各苏区政府自己去解释说明要有效得多。可以说在第一次全苏代表大会之后,苏维埃区域内的经济,在临时中央政府正确执行第一次全苏大会关于苏维埃经济政策的原则决定之后得到了极大的成功,这种成功,使得商人能够安心营业,从而促进市场的流通,保证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和交换。

商人政策的改变的重要作用还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保障。这种保障不仅在于吃、穿、用等物质上,还在于党在苏区的政治影响上。之前苏区各物资紧张不仅仅是对普通群众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对于红军的生存同样也是严重的威胁,商人的市场活动受到保护之后,市场兴盛同样也能使红军得到谷物、棉衣、药品等物质资料。而商人的政治倾向多以是是否能够获利为依据,因此地位的改变也能使商人对于红色革命给予同情和支持,扩大苏区的政治影响。当时各苏维埃政府已经注意到商人虽是剥削分子,但在土地革时期,是以铲除封建剥削为主要任务,对于商人当然不能按照对豪绅地主一样地加以打击,无论何种商人,只要他不违反苏维埃一切法令,不勾引敌人做反革命的事,不垄断经济,苏维埃政府是应该允许商人在苏区自由营业的。当商人能够在苏区安身立命后,他们自然会站在中共这边,并且无论从自身利益出发还是考虑国家前途,他们定会积极为苏区的经济发展作贡献,以突破苏区当时的经济困境,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6 结语

从1927年到1932年苏区整体的商业发展情况是:1927年到1930年主要是一片衰败,市场不兴,经济凋落、门庭惨淡;1930年以后又陆续有许多商铺重新开业,各市镇圩场贸易渐渐活跃,往来商贩络绎不绝。商业的兴衰客观上受敌人经济封锁和战争的影响,但与党的商人政策正确与否有着重要的关系。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苏区的经济问题从根本上是对商人的认识以及商人政策问题。当把商人看作是剥削阶级,当成土豪地主一类的阶级敌人进行打击时,商人要么关门破产要么逃离苏区,加剧苏区面临的物资不足的经济困难;当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执行得好时,不仅苏区内的商人活动频繁,而且白区的

商人也能不顾国民党的重重关卡冒险进入苏区进行商品交换。但是我们也不能对当时中共一开始的错误商人政策进行严厉的苛责,因为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组织上都不够成熟,同时自身也面临着国民党的重重包围,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同时,即使是在“左”倾思想和盲动主义在党中央占支配地位的时候,毛泽东等一批领导人也能从中反省,做出改正,并且推广正确的商人政策。土地革命时期的商人政策虽然历经波折,但是中共不断在实践中摸索真理、与错误作斗争的历史经验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著.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 [3]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策略[J].布尔什维克,1927(5).
- [4]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上[M].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 [5] 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G].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 [6] 毛泽东.中共闽西特委总报告(1929年8月22日)[R].南昌:江西省图书馆.
- [7] 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8] 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商人条例(1930年3月25日)[Z].南昌:江西省图书馆.
- [9] 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经济政策决议案(1930年3月25日)[Z].南昌:江西省图书馆.
- [10]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 [11] 柯华主编.中央苏区财政金融史料选编[G].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
- [12]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 [13] 万安县文史档案局编.万安县申报中央苏区县材料汇编[G].万安县文史档案局,2012.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著.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